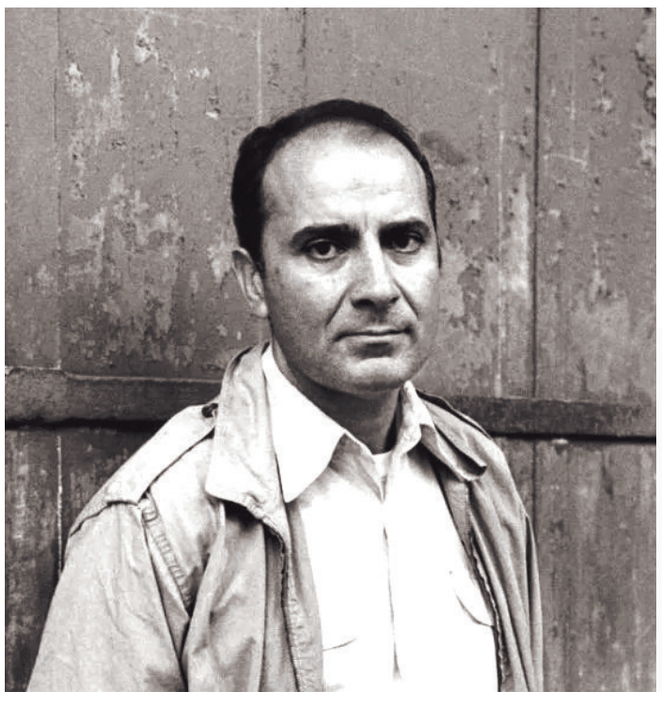


曼努埃尔·普伊格《热带黄昏》：

身在黄昏，心有明灯

□李谷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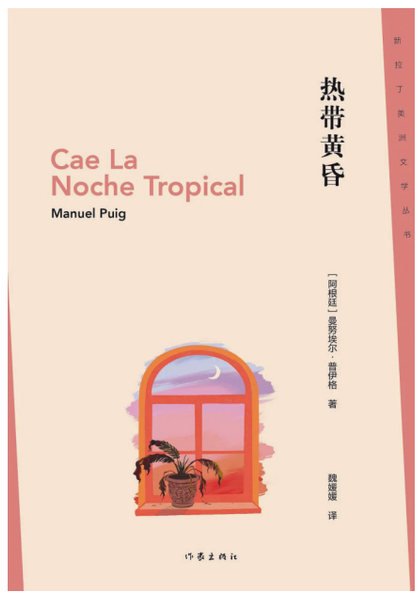
曼努埃尔·普伊格（Manuel Puig，1932—1990），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当代作家。拉丁美洲“爆炸后文学”时期代表人物，拉美文坛“新叙事文学”第二代作家。1950年普伊格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攻读建筑工程学，后转入哲学系。代表作有《丽塔·海沃兹的背叛》《红红的小嘴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事件》等。除了小说，普伊格也创作话剧剧本和电影脚本

阿根廷作家曼努埃尔·普伊格的收官之作《热带黄昏》（作家出版社，2026年6月）围绕老年姐妹尼迪娅和露西的对话展开，将个体记忆与民族命运交织。这一特点并非《热带黄昏》所独有。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的小说《长日留痕》就以主人公史蒂文斯的暮年映射大英帝国的衰落。类似地，在《热带黄昏》中，普伊格也借看似属于个体际遇的老年女性困境折射出更宏大的流散困境。小说中老妇人的情感表征、成因和能动性都对这一背景有所指涉。小说的老年叙事也因流散背景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作为拉丁美洲文学代表作的异质性。

小说的老年叙事流露出浓重的怀旧情感，这一指向过去的情感表征是对强调进步的西方传统历史叙事的直接反拨。小说怀旧的对象并非《长日留痕》中的辉煌帝国历史，而是普通人的日常家庭生活，代表着个体对幸福和人生意义的重新定义。故事并不遵循时间向前发展的线性逻辑，只在姐妹俩琐碎的对话中回环往复，她们回忆孙辈幼年时与自己亲近的情景，露西感叹“这世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被自己所爱之人紧紧搂着不放”，尼迪娅怀念战前为家人准备点心、忙碌却不乏温馨的场景。她们当初并未充分感受到其中美好，但在与子女天各一方的当下，昔日种种都化作一句“当时只道是寻常”。循着两位主人公的心路历程，怀旧情感的与日俱增伴随着对平凡生活价值的重视，引发人们对背后原因的思索和探究。

就情感成因而言，小说中的老年困境与历史密不可分。引发怀旧的通常是“今不如昔”的感受。正是宏观历史背景加剧了小说中老年姐妹内心的脆弱。在小说《长日留痕》中，渴望辅佐勋爵成就一番伟业的史蒂文斯的境遇代表着“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破灭的失落，是对传统等级制度的哀悼。与《长日留痕》不同，《热带黄昏》中人物的需求更为基础，“穷则独善其身”的愿望都难以满足，也因此折射出国家更深重的危机。20世纪80年代，在“半个阿根廷都在流亡”的时代背景下，这对老年姐妹寻常的家庭生活也成了无法复刻的奢侈。丧女的尼迪娅反复表示羡慕露西的两个儿子都健在，露西却自嘲一个儿子在几千公里之外，另一个则忙于工作。她们当下生活的巴西在军人政权的统治下面临经济明显衰退、通货膨胀严重的窘境，孩子的缺席包含谋生的无奈，暗示她们难以得到陪伴的状况与民族危机之间的关联。小说呈现出对普通人命运的深深关切。

邻居西尔维娅尚处在从中年到老年的过渡期，强烈的孤独感受却毫不逊于这对年事已高的姐妹。她的内心也承载着怀旧情结，对丧妻的中年男子费雷拉有着近乎执念的迷恋，“就像怀念永远失去的爱物一般”。尼迪娅起初对她带有用情不专的偏见，后来发现事实截然相反：她过度沉溺于这段感情，恐惧失去，不惜谎称自己不乏追求者来展示自身的魅力。身为心理医生的西尔维娅清楚自己情感的来由，费雷拉与她从阿根廷流亡到墨西哥时的旧情人有相似之处，费雷拉对她的吸引力并非来自他本人，在更大程度上是她关于过去的幻想的投射。他在她心中的映像修补了记忆中的不完美之处，“比起金发消瘦的旧爱，这位却没有那位的缺点”。两位老人在谈话中提起，西尔维娅的儿子前往墨西哥求学工作，也不主动写信，甚至导致西尔维娅思念成疾。正是亲情的疏离和压抑已久的对情感的渴求，才使她将情感寄托在一个现实中很少给予她回应的男人身上。西尔维娅缺乏精神支点的情感状态映射出漂泊无依的生存现实。小说接近结尾时，西尔维娅在写给尼迪娅的信中提到，儿子所在的墨西哥正经历严重经济危机，阿根廷同样如此。此前在给露西的信中，西尔维娅坦承，“我远渡重洋，努力适应不同的国家，研究它们，学着像爱阿根廷那样爱它们。可最终得到的，竟是要依赖一通电话才能继续呼吸”。她以“匍匐茎”一词自比，在爱情里的卑微状态只是在异国漂泊的辛酸心情的一角。小说通过她“沉迷单相思无法自拔”的情感症候诊断出流散生活对个体存在感的冲击。



《热带黄昏》，【阿根廷】曼努埃尔·普伊格著，魏媛媛译，作家出版社，2026年6月

尽管以细碎的笔调展开，《热带黄昏》的情感力量毫不逊于宏大历史元素介入的文学作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有所突破。依然以《长日留痕》为参照，主人公史蒂文斯难以直面人生重大抉择的错误，到结尾才幡然醒悟，一改怀旧的口吻，决定把握生命最后时光。《热带黄昏》中的怀旧却充当了抵抗流亡孤独、改善暮年困境的精神力量。弗里曼认为，受将衰老视为衰退的社会文化影响，老年叙事容易呈现出闭锁状态，表现为不再有更多的过去可被讲述，也不再有更多的未来有待讲述。小说中的怀旧见证了这对老年姐妹超越闭锁状态。作为一种在理想化时空建立情感纽带的补偿机制，怀旧减轻了已经发生的生离死别带来的痛苦，也缓解了将要失去的恐惧。现实中失去女儿的尼迪娅仍能想象女儿艾米尔森见到自己梳着她喜爱的发型，并能在失去露西这一最重要的情感支柱后前往异国生活。

怀旧并非老年群体的特有情感，小说中还形成了跨年龄情感共同体，在未来这一维度降低老年闭锁的风险。伯尼斯·纽加滕将老年群体划分为55岁至75岁的“年轻老人”与7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认为前者相对具备维持健康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条件，后者则需要外界的更多支持和照护。小说中的姐妹年过八旬，已属于高龄老人的范畴。书中不止一次提到，露西遭受脚疼的困扰，爬楼梯和在海边散步都受到限制；尼迪娅则患有高血压，饮食有所顾忌。然而，在与年轻人的交往中，这对老年姐妹并非被动承受关怀者，同样怀念过去的西尔维娅愿意主动向她们倾诉。西尔维娅致信尼迪娅的儿子，在露西去世后如此评价这位老人：“于我而言，她意义非凡，仿佛是阿根廷故土在我家旁的一隅，是近在咫尺的心灵归处，是真正的避风港湾。”露西去世后，尼迪娅和西尔维娅的联系更为紧密，在尼迪娅的感染下，西尔维娅主动给儿子写信，并得到了回应。

小说的黄昏场景渲染了忧伤的氛围，正如露西在开篇提到“天快黑了，人就会忧郁”，但随即表明“独居老人的家里总是灯光微弱，所以我喜欢家里灯火通明”，这种寻求积极改变的态度在小说中一以贯之。无论是从美好的往事本身获得慰藉，抑或是在怀念过往这一共同情感中感受共鸣和归属感，都是心灯不灭的证明。

（作者系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谁来决定『对』与『错』

——读安妮·卡森《错误的诺玛》

□王文韬 佘军

兼具诗人、翻译家与古典文学学者身份的安妮·卡森，不断跨越诗歌、小说、戏剧与文学批评的边界，展开语言与形式的实验。其于2024年出版的《错误的诺玛》（*Wrong Norma*）延续了这一创作特色，以25篇题材各异的作品，将文学经典、古典哲学、日常琐事与当代事件纳入文学书写。这些各有旨趣的作品并不受某一主题的统摄，但其中若干篇章却呈现出共同的思想关切：语言如何影响人们对事物的理解与判断？

解释的偏差

卡森善用日常事物的象征与反转，呈现人们如何受既有经验影响，以主观解释误读事物。在《与约瑟夫·康拉德共度一晚》中，一盘普通的白面包便成为误读的对象。叙述者因偶遇一名男子而联想到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便想象自己以康拉德的身份观察世界。参加一场洗礼后的聚会时，她注意到摆在阳光下的面包：洁白的面包置于精致的瓷盘之中，与周围的蛋糕和乡村风光相映成趣。经过一番联想，这盘面包竟被赋予庄严的历史意味，成为“文明史的一个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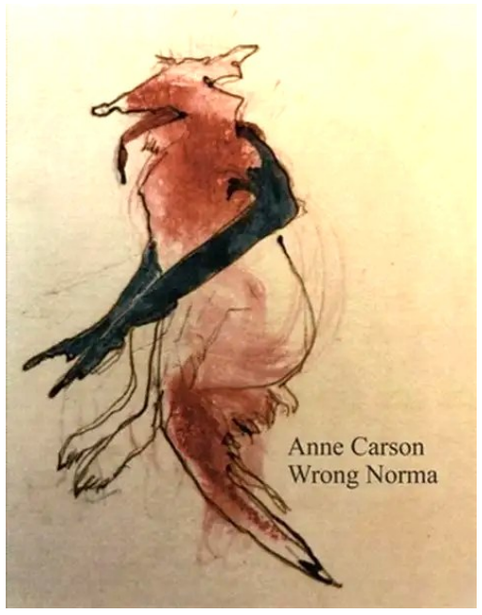
卡森有意让这一解释显得煞有介事。叙述者不仅细致描绘面包的颜色、光泽与摆放位置，还将自己的文学经验投射其上，使原本平凡的物品承载起厚重的文化意涵。数十个“曾经……”片段的缀连，其间穿插对康拉德、哈代、歌德与拉康的援引，文学典故与联想逐层叠加，不断强化叙述者阐释的说服力。然而，文章结尾突然改变了叙述方向。当叙述者向女主人询问白面包究竟有何象征意义时，对方却解释，面包的出现只是因为姐妹在电话中会错了意。此前层层累积的解释，顷刻间被一个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瓦解。

这一反转揭示了文学阐释与事实之间的距离：白面包可以承载丰富的象征意味，却并非因此才出现在餐桌上。借助康拉德的身份扮演与白面包的象征化过程，卡森引领读者经历了一次从赋予意义到发现误读的认知转变。作品中接连出现的文学典故与理论联想，固然拓展了叙述者理解事物的方式，也可能使她将自己的阐释误认为事实本身。幽默背后，卡森以克制的笔调点出：丰富的知识储备诚然能拓宽理解世界的维度，但同样容易诱发智识上的过度自信，让人误以为已经洞悉了事物的意义。

命名的偏见

误读不只发生在解释之中。那些看似平常而中立的词语和分类，也可能暗含偏见。在《又是福楼拜》中，一位渴望冲破传统小说桎梏的写作者仅因在教堂中交叉双腿便心生不安。这一寻常动作使她开始怀疑约定俗成的礼仪规则，并联想到学生时代读到的毕达哥拉斯式二元分类：善、男性、光明、有限、笔直与准确被归于一侧，恶、女性、黑暗、无限、弯曲与迷失则被置于另一侧。她不禁发问：“直线在伦理上是否比曲线更优越？”卡森追问表示“弯曲”的词语为何会同时指向“犯罪”。这种看似荒诞的语义跳跃，揭示了语言分类中潜藏的价值倾向。一旦某种判断经由不断重复而固化为习惯表达，人们便很容易将其视作理所当然，而遗忘它本是人为建构的产物。

这一问题在《埃迪》中得到了更为具体的呈现。埃迪在谈及血迹检验时，将吸毒者使用的器具称为“针头”，却将急救人员使用的器具称为“注射器”。这一表述上的差异使叙述者开始思索词语选择与社会身份之间的联系。卡森让这一疑问从人物交谈中自然浮现，提醒读者，语言在承担描述功能的同时，也在不经意间参与了对人的区隔与评价。



《错误的诺玛》英文版封面

判断的限度

当语言进入制度与社会生活，其分类和判断的局限更加显著。《命运、联邦法院、月亮》聚焦美国联邦法院的庭审现场，书写也门男子费萨尔寻求司法回应的艰难历程。与通常围绕案件经过展开的线性叙事不同，卡森反复运用“……的命运”这一句式，将费萨尔及其家人的遭遇、法庭上的法律辩论、法官佩戴的珍珠、工作人员的举动乃至夜空中的月亮并置，使一桩法律事件重新显现为由具体经验交织的生活现实。

卡森还将对语言与判断局限的反思指向文学创作自身。在《埃迪》中，叙述者试图为一名因痛苦与愤怒而缝合自己嘴唇的难民营少年创作十四行诗，却发现自己并不真正理解他的全部经历。最终，她因怀疑自己未经证实的想象而停笔。这一写作的搁浅，是卡森对文学表达限度的一次自我审视。在《命运、联邦法院、月亮》的结尾，面对沉默的费萨尔，叙述者同样承认自己无法确定他内心的想法：“我怎么会知道呢？”通过停顿、追问与未被解答的问题，卡森为个体经验保留了空间。

卡森的文学实验始终在追问：谁有权判定一种解释是否正确、对他人的评价是否公允？而这些判断，往往离不开人们用来描述世界的语言。语言既传递了对事物的理解，也可能在不经意间带入某种立场。即便是写作者，也无法仅凭想象道尽他人的经历。卡森似乎并不急于为“对”与“错”寻找最终的裁决者，而更关心语言如何形成判断，又有哪些事实与声音在这一过程中被忽略。卡森创作的难得之处，或许正在于她以文学的敏锐与审慎，让语言和判断的对错之辨成为理解复杂现实、体察个体处境的一种努力。

（王文韬系南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佘军系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动　态

中国—中亚文学天山论坛在京举行

10月22日，中国—中亚文学天山论坛在京开幕。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秘书处共同主办，以“‘一带一路’与文学共同体”为主题，汇聚来自中国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五国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与中亚文学交流的优良传统与当代使命深入研讨。

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安德明在致辞中说，中国与中亚各国山水相连、人文相亲，古老的丝绸之路将先民的足迹紧密联结，李白的诗篇、艾特玛托夫的名作等，共同构成了中国与中亚各国文学文化实践与交流的生动图景。他表示，文学是不同文明之间最深刻、最持久的对话形式，举办本届论坛，是为了积极落实中国—中亚峰会共识，进一步发挥文学增进理解、凝聚共识、赓续友谊的纽带作用，搭建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民心相通的文化桥梁，让丝路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更加夺目的光彩，推动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副秘书长李维建表示，本届论坛的召开，一是搭建了中国—中亚文学研究的重要平台，有力促进双方文学研究的深入交流；二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对夯实中国—中亚人文交流的根基、促进民心相通具有重要价值；三是呼应了新时代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新要求，文学作为心灵的桥梁能够发挥独特作用。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外学者立足各自研究领域，围绕大会主题作了精彩发言。这些发言从史诗传统、经典译介、思想共鸣与表演传承等维度，贯通历史与当下，阐释了中国—中亚文学共同体的深厚根脉与当代表达，也为以文学互鉴夯实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先在论坛闭幕式上作学术总结。他表示，本次论坛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既有对中国与中亚文学交流史的深度钩沉，也有对文学共同体建设的前沿思考，充分彰显了文学在促进中国—中亚文明互鉴中的独特价值。与会者表示，将以本次论坛为契机，深化机制化合作，让古老丝路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光彩，共同书写中国—中亚文学交流互鉴的新篇章。（于　帆）



阿根廷画家Alejandro M. Parisi作品

世界文坛
SHIJIE WENTAN